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

谈谈如何写好文章

HAO WENZHANG SHI
MO CHULAI DE

TALK ABOUT
HOW TO WRITE
A GOOD ARTICLE

许海清◎著

文章千古事 文章乃经国大业 非常之业必有非常之文 三篇文章做得好 思想是文章的海拔线 四面江山来眼底
心头 文章好比一棵树 无逻辑不成文章 文章不写半句空 领异标新二月花 为文喜见风雷笔 写文章要看
说家常话 功夫在诗外 文如其人 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 方法的方法比方法重要 读万卷书写万篇文 盛世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

许海清◎著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——谈谈如何写好文章/许海清著.
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2014. 3
ISBN 978-7-5035-5217-5

I. 好… II. 许… III. 汉语-写作-文集 IV. H1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6993 号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——谈谈如何写好文章

策划编辑 王 君
责任编辑 蔡锐华
版式设计 李 灵
责任校对 马 晶
责任印制 宋二顺

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(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邮 编 100091

网 址 www.dxcbs.net

电 话 (010) 62805800 (办公室) (010) 62805824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双青印刷厂

字 数 152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0.5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



目 录

- 第一讲 文章千古事 (1)
- 第二讲 文章乃经国大业 (9)
- 第三讲 非常之业必有非常之文 (17)
- 第四讲 三篇文章做得好 (25)
- 第五讲 思想是文章的海拔线 (33)
- 第六讲 四面江山来眼底 (41)
- 第七讲 万家忧乐到心头 (49)
- 第八讲 文章好比一棵树 (57)
- 第九讲 无逻辑不成文章 (65)
- 第十讲 文章不写半句空 (73)
- 第十一讲 领导标新二月花 (81)
- 第十二讲 为文喜见风雷笔 (89)
- 第十三讲 写文章要看对象 (9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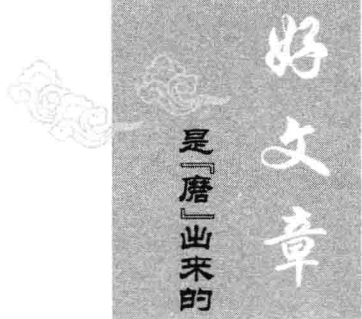
好文章
是『磨』出来的

第十四讲	佛家只说家常话	(105)
第十五讲	功夫在诗外	(113)
第十六讲	文如其人	(123)
第十七讲	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	(131)
第十八讲	方法的方法比方法重要	(139)
第十九讲	读万卷书写万篇文	(147)
第二十讲	盛世出文章	(155)
尾言絮语	(161)

文章千古事



第一讲



我经常对人讲，中国是文章大国，很多人都很赞成。回首历史，自仓颉造字以降，中国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、不绝的文化遗产，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章大家、浩如烟海的佳作名篇、科学系统的文章学理论，成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。

一

纵观历史，中国的文章大家、佳作名篇层出不穷。中国文章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，在据传为神农和尧舜时期的《蜡辞》《击壤歌》《康衢谣》《卿云歌》等歌谣中，已经出现单纯质朴的韵语。在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中，开始出现用于记事的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，标志着中国书面文章发展的萌芽。先秦时期，正式开启了中国书面文章的发展繁荣历程。从先秦的诸子百家，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师，以“三曹”“建安七子”“竹林七贤”为代表的魏晋文学典范，到唐宋两代的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苏轼等伟大诗人、词人和开创古代文体新模式的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到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等元曲名家，明清两朝的白话小说家，五四运动之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现当代文学家文章家，可以说，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每一个时期，都产生了继承传统文化、契合时代特征、开创崭新领域的大师级人物。在他们的引领下，形成了覆盖广泛、内容丰富、思想深刻、雅俗共赏的文章宝库，这其中既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诗歌典籍，也有《孟子》《韩非子》等政论文章；既有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历史著作，也有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白话小说；既有《弟子规》《千字文》等通俗读物，也有《易经》《传习录》等哲学经典。这些佳作名篇经过古人的筛选、编辑，结成了以《昭明文选》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《永乐大典》《古文观止》《四库全

书》等为代表的名家名著选本，仅现今存世的就数以百计，不仅有效承载了文章大家的成果，普及了传统文化，更为历史研究、文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，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。

历朝历代，文章及其作者都拥有相当崇高的地位。在古代文献中，对于文章的社会地位多有阐述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中提出，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；《典论·论文》中认为，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”；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中也写道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？”进而又细化为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，可以说都将文章摆到了极高的位置。《左传》有言：“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文章因而成为达到老子所说“死而不亡”境界的途径之一，而相比立德、立功，立言更多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，并且德行事功要传诸后世，必然要借助文章的力量。于是，在追求“不朽”的动力驱使下，文章之道成为历代有识之士的高尚追求并不断被加以传承。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下，作为文章创作主体的文人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敬就不足为奇了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“士”的内涵逐渐由武士被文士所取代，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。他们虽然没有贵族的地位，但也不用像庶民那样从事耕作，而是作为贵族的家臣、谋士，为重要决策提供参考，甚至“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”。汉朝时，皇帝宠用有才华的官吏，通过“策对”和察举孝廉选拔上来的读书人，经常被加以侍中、常侍、给事中之衔，协助处理奏章。汉武帝之后，“六尚”之一、本来是管理皇帝文书的尚书开始负责起草诏书，地位不断提高。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，而科举制度最重要的考核方式就是写文章，从而使写文章成为学子士人出仕做官的必要条件，选拔出的人才自然也是写文章的高手。唐朝时，负责处理奏章、拟定诏书工作的，外有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，内有馆院、翰林学士，其中大部分是文人，当时宫殿前的台阶上立有巨大的石螭，文人、学士们站在台阶前朝见皇帝，被称为“独占鳌头”。这些人不仅可以左右皇帝的旨意，甚至有时能够驳回皇帝的旨意。皇帝的命令如果未加盖“中书门下之印”，当时即为违

法，不能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，所以有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”（凤阁、鸾台即为中书省、门下省）的说法。宋朝更是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传下了“不杀读书人”的祖训，足见对文人的重视程度。不仅宋太祖亲自叮嘱宰相赵普多读书、读《论语》，且后来的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文章大家都曾在朝中身居高位，整个社会掀起“崇文”的风气，带动了文化的极大发展。明朝时，设中极、建级、文华、武英四殿和文渊、东阁两阁，其中的大学士地位尊崇，常由六部尚书或经筵讲官（皇帝的老师）兼任，一切奏章、政事、诏令都要经他们的手，掌有对皇帝朱批的“票拟”之权，在皇帝年幼时，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皇帝的职责。清朝时，虽然另设军机处办理重要奏章和皇帝密谕，但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中挑选出来的，实际上仍然是文人在直接辅政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写文章极为重视，就如何写文稿、怎样改进文风等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和指示。其中，作为文章家、著作家的毛泽东谈得特别多，著有《纠正文字缺点》《反对党八股》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等大量相关作品。他提出，“一切较长的文电，均应开门见山，首先提出要点，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目的或结论，唤起阅者注意，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，不得不继续看下去。有些写得好的报告，虽然篇幅颇长，却能引人阅读，使人不厌其长，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却使人难看。”“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，生动活泼的，表现实际生活的。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，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，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，像瘪三一样，瘦得难看，不像一个健康的人。”“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：准确性、鲜明性和生动性”。这些重要论述，观点深刻、指导具体，而且形象生动，对文章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不仅如此，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身实践，撰写了大量重要文章，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二

几经传承，中国逐渐形成完备的文章学体系。在文章写作实践

中，中国历来重视文章学理论的探索和完善，在什么是文章、如何写文章、如何评价文章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，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学者就借虞舜之口在《尚书》中提出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，对各类文章的功用做了探索性的区分。陆机的《文赋》、钟嵘的《诗品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，带动了文章学走向独立，使得文章学第一次获得了科学意义上的系统研究，标志着中国文章学基础理论初步构建完成。唐宋时期，不仅以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对象的“注疏文章”极大繁荣，文章家们对“骈文”和“古文”的写作手法也不断革新，文气、文势、文法等文章学中的重要概念不断问世并得到深入阐述，丰富和完备了既往的文章学理论。明清时期的文章评注，不仅集合了前期历代文章学的研究成果，还对古典文化的向心凝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使文章学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文章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，继承传统文章学的精华，同时吸收西方美学理论、文字学理论、语言学理论等优秀成果，推动中国文章学不断走向科学化、系统化、现代化。

中国的文章学涵盖广泛，涉及到文章分类、写作、批评、功用等多方面的研究，内容不断完善，体系博大精深。以公文分类体系为例，西周时期，下行的王命文书仅有“诰、誓、命”几种，上行文书为“上书”，各诸侯国和官吏之间的平行文书也只有“檄文”“移书”等。到两汉时期，下行文书就已经细分为“制、诏、策、册、敕、教、令、谕、符、檄、旨”等一二十种，上行文书细分为“奏、章、表、驳议、牒、申、启、呈、笈、题、状”等多种，平行文书也增加了“关、咨、照会”等分类。后来几经变革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从国家层面几次对公文种类进行重新划分，现行文种变为13类13种。公文分类体系仅是中国文章学中的一部分，其发展、变化的内容竟如此丰富，由此可对中国文章学体系之庞大窥豹一斑。

文章学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辞章、训诂、注疏、声律等诸多学科的产生和发展，还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写作教育肇始于西周，在孔子的私学教育结构中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——言语。而随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于“士”的重要性认识的提高，出现了专门的

养士场所，实际上也就是早期进行文化教育的半官学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齐威王或是更早一点的时期兴建的稷下学宫，这所学宫一直延续到齐国的灭亡，对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当时著名的孟子、邹衍、荀子等都曾在此停留、著书，荀子还曾担任过学宫祭酒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。到了东汉时期，出现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艺专门学校——鸿都门学，生员专攻尺牍、小说、辞赋、字画，其中“尺牍”包括“章”“奏”“表”“驳”“书”等实用文体，小说、辞赋等则属于审美文体，彼时的教育已经涵盖了实用与审美文体两方面的教育。南北朝时期，宋文帝开设文学馆、玄学馆、史学馆、儒学馆，其中文学馆专门从事文章研究与教学，将写作课程与其他学科并列，自成一体。科举制度建立后，文章写作能力正式成为政府考核、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，其受重视程度远非其他学科可以相提并论。可以说，正是这种通过文章发现人才，经由人才完善理论的良性循环，促进了中国文章学的极大发展。

三

俯古观今，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文章始终受到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，源于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了并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一是承载文明。“文以载道”，文明成果要通过文章向下传承。“《诗》，所以会古今之志者也；《书》，□□□者也；《礼》，交之行述也；《乐》，或生或教者也；《易》，所以会天道人道也；《春秋》，所以会古今之事也。”正如上述《郭店楚简·语丛》所论述六经的重要作用一样，内涵深刻的诸子学说，华美典雅的诗词歌赋，饱满厚重的古代历史，在形成文章之后，才能穿越几千年的漫长岁月，使今人能够近观古人。试想没有《论语》，我们怎能系统了解孔子的伟大思想？没有《二十四史》，我们怎能详细知晓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？没有《红楼梦》，我们怎能切身体验当时的社会风俗？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中，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都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，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，它们都已经衰落，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并延续至今。这其中，文章的承载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。二是教化大众。人非生而知之，需要通过教育明辨是非、知悉

事理，尤其是在古代没有普及官办教育的情况下，通过文章发挥教化作用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受到文章家的普遍重视。孔子论诗时说，“诗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推而广之，强调的不仅是诗，也是全部文章的教化作用。而文章中的“纪实”“讽喻”“寄托”“想象”等诸多手法，也多是為了更加激发人的兴趣，起到更好的教化效果而采取的艺术手段。从彰显微言大义的《春秋》，到半部可治天下的《论语》，再到为“六经国史之辅”的《醒世恒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喻世明言》，历代文章对教化作用尤为重视。这种教化不仅针对普通民众，也适用于治国理政者。民众被教化，可以“经夫妇、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移风俗”，治国理政者被教化，可以施仁政。三是凝聚民心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地貌复杂，在古代交通、通信并不发达的条件下，通过各种政令和军事手段只能在行动层面维护国家统一，在思想层面却无法保持国家整体的凝聚力，尤其是对底层民众，很难使其时时刻刻与国家发生必然的关联，也就无从进行有效的治理。文章凝聚民心的功用由此凸显。通过《论语》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增广贤文》等易被大众接受和便于口口相传的文章作品，使全国民众形成统一的、朴素的价值观，这种价值观既与广受推崇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，表述方式又更贴近实际，不仅是民众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指南，更是其对国家产生认同的基础，从而使中华民族历史上多次在短暂分裂后重新形成团结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

中国的崇文传统一以贯之。身处这样一个具有“以文辅政”优良传统的国度，回望先贤往圣的精神丰碑，重温文章大家的佳作名篇，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文章的作用，没有理由低估文章的地位，没有理由不将到达文章写作的更高境界作为自己的追求。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，理所当然要勤于学、潜于心、敏于行，将所习、所思、所成体现到文章中，更好地服务于空前伟大的事业。

文章乃经国大业



第二讲



曹魏开国皇帝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明确提出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，曹丕把写文章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道出了文章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。文稿格局之高低、气象之雄弱、思想之典俗，不仅代表作者的思想境界，而且反映一个时代的气象。时代之雄盛，朝代之兴旺，往往伴随着文稿之隆盛、之峥嵘。古今中外的文明发展史表明，凡是比较昌盛或重要的时代，文章都被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摆在重要位置，帮助执政者延伸治理领域、提升治理能力，打造“纸上江山”。

一、中国历来高度重视“以文治国”

中国古人对文章的政治作用有清醒认识，有过很多论述。孔子认为，诗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得失，可以团结人，可以抒发怨愤不平。近可以侍奉父母，远可以侍奉君王。黄庭坚说：“文章功用不经世，何异丝窠缀露珠。”意思就是，写文章如不能经世致用，造福社会，就像蛛网上的露珠，没什么用。欧阳修说：“文学止于润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”欧阳修、苏东坡这样的大文学家写的有价值的诗文，绝大多数是其参政议政的反映、记录与武器，用于个人遣兴娱情的不多。今看《东坡全集》计33卷，除1—9卷为赋、诗、词外，10—33卷全是各体公私实用文章，含论议、策问、史评、表状、制策、诏告、书柬、尺牍及记传碑铭赞序题跋杂记之类，无一篇没有特定的实用场合、特定的写作程式。就连诗词赋这类“纯文学作品”中，相当一部分也是为参政议政服务的，是“唯歌生民病”的。司马光用19个春秋，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这部编年体的辉煌巨著，全书上起东周威烈王，下迄五代后周世宗，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，蕴含了15个朝代的兴衰荣辱，共294卷。宋神宗读后，认为这部书能“鉴于往事，资于治道”，因而有“资治通鉴”的命名。

文章被封建王朝作为重要的统治工具。刘邦称帝之后，陆贾经常找机会与他谈论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，刘邦很不耐烦，训斥陆贾道：“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来的，哪里用得着《诗》《书》！”陆贾回答说：“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，难道您也可以马上治理天下吗？商汤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，然后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。文治武功并用，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上策啊！从前吴王夫差、晋卿智伯都是因极力炫耀武功而使国家灭亡；秦朝也因一味使用严酷刑法不知变更，最终导致灭亡。假使秦朝统一天下后，行仁义之道，效法先圣，那么，陛下您又怎能取得天下呢？”刘邦听后虽然有些不悦，但还是觉得陆贾的话很有道理，脸上露出惭愧之色，对陆贾说：“那就请你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掉天下、我们得到天下的原因在哪里，以及古代各个王朝成功失败的原因之所在。”于是，陆贾就奉刘邦之命一共撰写了12篇文章。陆贾每写完一篇文章就进献给刘邦阅览，刘邦对每篇文章都赞叹不止，刘邦身边的大臣们看了陆贾的文章，也都感慨异常。陆贾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，命名为《新语》。从此，刘邦就用陆贾的建议治理国家。秦汉之后的封建王朝，都十分重视文章在统治中的重要作用，这一点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在机构、制度等方面做了很多改进和调整，有效实现了“马上抢政权，文章稳天下”的目标。

文章对近代中国革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在辛亥革命中，革命党之所以能够胜利，舆论宣传功不可没。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以后，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已完全被动。清政府不重视、不善于利用以报纸杂志为主的新式媒体，在革命党人凌厉的舆论攻势下，节节败退，民心逐渐丧失。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着舆论宣传的主导权，在海内外有几十份革命刊物，仅在上海就有《苏报》《民呼日报》《民立报》等10多种。于是，武昌城里的星星之火，迅即转化为燎原之势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统区大批戏剧工作者组成流动演出队，走向农村、内地和前线，郭沫若、老舍、夏衍等作家创作了许多抗日题材的剧作，充分发挥了戏剧为抗战服务的积极作用。被戏剧界称为“好一计鞭子”的三个短剧（《三江好》《最后一计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）几乎演遍了大江南北，激起广大民众抗敌救国的热情。1938年3月27日，“中

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成立，提出了“文章下乡，文章入伍”。国统区的文艺刊物都大篇幅地发表通讯和报告文学，如实地反映全国军民浴血抗战的史实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，推动了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。

文章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神奇效能。毛泽东发了几篇新闻稿，就曾经吓退 10 万国民党兵。1948 年 10 月，党中央进驻河北建屏县（今属平山县）西柏坡。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，准备出动近 10 万大军突袭中共首脑机关。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，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 1 万多人，形势十分危急。10 月 26 日，毛泽东处理完几项重要工作以后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。”周围的人不明白：“我们身处险境，还要给别人厉害看？”只见毛泽东拿起笔，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：《动员一切力量，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》。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图谋，包括各部队番号、将领以及作战计划等予以揭露和公布，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 3 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。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，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了如指掌，还做了准备，深怕遭到埋伏，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。这出现代“空城计”就这样结束了。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，直到进北京。

文章推动了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。1978 年 5 月 11 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登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。当日，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。5 月 12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同时转载。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“实践第一”的观点，鲜明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，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。但当时依然存在着“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”错误倾向，这是“四人帮”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，必须坚决打碎。这篇文章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冲锋号，引发了关于实践、真理问题的大讨论。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，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，对解放思想、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历史影响。